

中国近现代史卷

浙大史学精粹

陈红民 主编

汪林茂 徐立望 尤淑君 陈红民 方新德 肖如平 赵晓红 陈群元 梁敬明 张凯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Zhe da Shi xue Jing cui

新大正平權

新大正平權

新大正平權

新大正平權

中国近现代史卷

浙大史学精粹

陈红民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大史学精粹. 中国近现代史卷 / 陈红民主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308-12325-9

I. ①浙…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历史—近现代—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797 号

浙大史学精粹——中国近现代史卷

陈红民 主编

责任编辑 葛玉丹(gydan@zju.edu.cn)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5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325-9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浙大史学精粹”主要收录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的老师们近年来公开发表过的学术论文，旨在展示他们最近10年来的关注重点与努力方向，看他们是如何在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之上，不断与时俱进，发掘新史料、运用新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检视 · 总结 · 再出发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2011 年底前在职教师的研究论文精选集粹。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源远流长，其前身是 1928 年 8 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创设的史学与政治学系（1936 年改称“史地系”）。建系以来，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向达、贺昌群、刘节、沈炼之、钱穆、方豪、张其昀、谷顾宜等先后在此执教，为历史学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使浙江大学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体的学校，杭州大学历史系遂执浙江历史学科之牛耳，其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地方高校前列，涌现出一批优势学科与知名学者。

中国古代史学科 1978 年获硕士点，1986 年获博士点，包括宋史、隋唐史、中西关系史、史学史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等研究方向。宋史研究始终处于国内学术界的前列，为南方的宋史研究中心，先后有陈乐素、徐规、梁太济、杨渭生、龚延明、何忠礼、包伟民等学者，其中有五人担任过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黄时鉴的元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影响很大，成果获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仓修良为中国历史文献学会资深副会长，在史学史研究、方志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孙达人的农民史研究、李凭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卢向前的隋唐史研究、倪士毅的浙江古代史研究、李志庭及阙维民的历史地理研究，均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 1982 年获硕士点，1993 年获博士点。其中郑云

山、汪林茂、郭世佑等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在浙江近代地方史、辛亥革命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金普森对于中国现代史、经济史(内外债)方面的研究,杨树标关于中华民国史、蒋介石、当代台湾史的研究,均具有较大影响,在史学界居领先地位。

世界史学科 1979 年获硕士点。世界地区国别史方面的法国史和德国史在国内史学界享有盛誉,其中法国史的研究实力雄厚,先后有沈炼之、楼均信、戴成均、郑德弟、沈坚、吕一民等学者,其中多人担任过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和秘书长,是国内有名的法国史研究中心之一。在德国史研究方面,丁建弘担任过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世界史前史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毛昭晰为这方面的知名专家,龚缨晏的研究也得到古代史学界的认可。王正平在史学理论研究、王渊明在欧洲人口史研究、杨杰在英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史学界所公认。

1998 年,四校合并,以杭州大学历史系为主体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科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从 1928 年算起,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已走过 80 余年的历程,其间有春风得意的顺境,也有艰难曲折的逆境。然而,历史学系的教师们始终坚守学术本位,辛勤耕耘,教书育人,努力钻研,使历史学系形成了务实创新的鲜明特色。1994 年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005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下属的各二级学科均有博士授予权)和五个硕士点,并设有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多年来为国家培育了大量史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与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

目前,历史学系师资队伍精干,现有的 33 位专任教师均毕业于国内外名牌大学,不少人具有在国外著名高校或科研机构访问、进修的经历。本系教师的国际交流活动频繁,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成果丰富,不仅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多项科研项目,而且不少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获得了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中国史(包含古代史、近现代史)是浙江省重点学科。浙江大学是国内获得中国古代史博士点较早的高校,宋史、隋唐史、中西关系史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等研究方向为本系的传统重点。尤其是本系学者利用地处杭

州的区位优势,长期以来在宋史研究方面辛勤耕耘,拥有雄厚的研究实力,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及研究人才,在全国处于同类研究的前列。近年来,中国古代史方向的教师在保持传统优势项目的基础之上,又从海外引进人才,开拓出江南区域明清史的新研究方向,组成创新团队,成果可期。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点主要包括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研究方向。在中国近代史方向,侧重于近代浙江社会的转型、学术史的研究。民国史研究方向,近年来,集中科研力量研究蒋介石及其与近代中国的关联课题,建立了国内唯一以蒋介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为本学科点的优势特色之一。该中心成功举办了大陆地区第一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向,以浙江省为基点,主要着眼于当代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乡村社会变迁史等方面的研究。最近,历史学系又利用所收集的珍稀地方史料,建立了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将致力于对保存完整的晚清至民国期间司法档案进行综合研究,成果将陆续问世。此外,我们还有其他基于第一手资料的新增长点:五万卷绍兴商会档案的整理工作也已着手进行;知名美籍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已将其全部中文档案捐献给浙江大学。

世界史获一级学科博士点,也是浙江省重点学科,主要包括法国史、美国史、日本史等研究方向。其中,法国史的研究始终是本学科的传统重点,研究实力雄厚,是国内有名的法国史研究中心之一。近年来,在法国近现代史方面,研究成果尤为显著。随着人才的引进,美国对外关系史、东亚区域史、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方向,成为世界史新的增长点。

为检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特意选编了这套《浙大史学精粹》,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三册,收入老师们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这套论文集虽然不够全面,但可以“管中窥豹”,它能展示最近十年来历史学系老师们的关注重点与努力方向,看到他们是如何在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之上,不断与时俱进,发掘新史料、运用新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

我们也正好利用编辑出版论文集,展示成果的机会,对历史学系近年来的科研做一个整体的检视,总结经验教训,砥砺前行,作为未来发展的坚强基石。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相信,依靠全系教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辅以学校有关繁荣人文社会科学 measures,浙江大学历史学系重振雄风、人才辈出、重大成果层出不穷的辉煌时刻,定在不远。

目 录

代 序 陈红民	001
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 汪林茂	003
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源于上书房“讲义”说: 兼论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的地位 徐立望	037
通儒抑或迂儒:思想史之焦循研究 徐立望	053
从剿拳到抚拳:涑水教案及其影响 尤淑君	071
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以 1887 年朝鲜遣使事件为中心的研究 陈红民	097
“民国史观”与中华民国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 陈红民	120
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 陈红民 段智峰	135
评国民政府的“官办”县政样板:“兰溪实验县” 方新德	163
论建国初档案工作的“学苏联”问题 方新德	181
九一八事变后的孙科内阁与对日绝交 肖如平	195
抗战时期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 肖如平	210
从反帝到反清:由浙路运动看辛亥革命之社会基础 赵晓红	225
中国驻清津领事馆的设置问题 陈群元	239
鱼鳞图册研究综述:兼评兰溪鱼鳞图册的重要价值 梁敬明	261
集体化及其困境:一种区域史的分析思路 梁敬明	272
江南(浙江)区域史研究论纲 梁敬明	289
“今”“古”之争:四川国学院时期的廖平与刘师培 张 凯	295

汪林茂



汪林茂,1949 年出生,浙江开化人,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现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史,其中对晚清文化史、浙江区域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尤为深入。在《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史学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已发表论文 40 余篇;正式出版论著有《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重庆出版社,1998 年)、《潮起潮落:浙江辛亥革命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年)、《晚清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5 年)、《浙江通史·晚清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等 8 种;另有编校《汪康年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年)等 2 种。

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

清末，在全面的民族文化革新和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语言文字也经历了一场颇有深度也颇有规模的变革运动。这场运动虽不似当时的兴办学堂活动那样的喧腾，但其意义之深刻、影响之深远、牵涉面之宽广和复杂则远远超过后者。这是因为，语言文字绝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工具、符号，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一定文化之产物的语言文字，它的发达的根系深扎于所自生长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与我们民族文化、以至于整个民族生活的筋脉紧密联系。尤其是在晚清时期急迫的民族危机阴影下，任何领域都不能不与“富强”、“救国”挂上钩，任何兴废改革行动都不能不置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政治视野下加以考察或定位，由此，语言文字的改革也就决不单纯是语言文字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的文化运动。因而，研究清末语言文字改革绝不可能自外于席卷于那个时代各个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同理，研究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不可能置民族文化重要表征的语言文字及其改革运动于不顾。必须把清末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置于清末民族主义思潮及运动的大视野下，才能更深入地认识清末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建设的运动，真正地弄清近代语言文字改革的科学与本体问题。

一 “民族振兴”驱动下的“切音为字”方案

甲午前后，在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为沉重的民族耻辱感的刺激下，民族振兴思潮勃然高涨。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启蒙主义者对此前的“求强”运动成败教训作了深入的总结，批评了器物求“强”路线是“仅袭皮

毛”、“补苴罅漏”，而对于前此已经出现的以“学”求“强”的路线则大力张扬：“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①“泰西所以富强，在于有学”；^②“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③即“学”——近代学术或知识体系的建设才是从根本上实现民族振兴的关键。

必须看到的是，甲午以后启蒙主义者所强调的“学”，与此前已有非常大的不同。

其一，甲午以后启蒙主义者所阐扬的“学”，不只是简单地将它作为强国之根本，而是将它作为民族振兴系统工程中的一环，即“学”的发达——人的理性本质的觉悟——民族振兴的实现。因为，甲午以后的启蒙主义者已是自觉地将“学”看做是“智”——人的理性本质的外在表现，“智”是“学”的内化，而且认为“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表征，是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矣；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④即人只有通过“勉强为学”而具备“学”（知识），才能成为具有“智”之本性的人，即完整意义的人；而且“学”越高深，越是能达到人生的崇高境界。

其二，“学”的主体已不是几个精英人物（诸如士大夫、洋务专才等），而是芸芸大众。甲午以后，启蒙主义者确认“民”是国家政治的主体，而且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在“民”的普遍的理性觉醒、达到“智”的境界之基础之上，进而呼吁“开民智”。他们的目标是：“必使全国四万万民皆出于学，然后智开而才足。”^⑤而且被他们列为文化启蒙对象的“民”，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农、工、商、兵”等下层民众，主张让他们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是“贫贱贩负之家，工农樵牧之侣”的子弟，也应“及时教以义

① 《上海强学会章程》，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89页。

② 《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片》，载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446页。

③ 《兵战不如商战 商战不如学战论》，《湘报》第145号，1898年9月3日。

④ 康有为：《长兴学记》，载《康有为全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47—548页。

⑤ 康有为：《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11—312页。

方，敦以实学，破其愚蒙，启其智慧”。^① 因此，与传统时代的科举精英教育、洋务时期培养“专才”教育的指导思想不同，无论是兴办学堂或报刊、出版、学会等文化活动，都是致力于“学”的普通化、普及化。

这就逻辑性地引出了对“学”之载具的语言文字问题的思考——启蒙主义者从对中西落后与先进的对比和探讨中看到，国家的先进与落后，取决于国民的“智”——文化素质，而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则是一国之民识字人数的多寡。他们看到了这一事实：“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之九，少亦几十之二。……（中国）计今之识字者，男约百之一，女约四万得一。”^②“民”的普遍文盲，是“学”的普及化、普通化的最大障碍。一些有识之士进一步指出，造成中国之民识字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汉字的繁难。而汉字的繁难则是由其文字制度造成的，其中最根本的是“泰西（文字）切音，中国（文字）象形”。^③ 由此又带来了汉字的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因为汉字“象形”，所以字数庞大，总字数达四万余，常用字也有四千多，士子非读完“十三经”、非耗费十余年功夫不可能掌握，“人生可用者几次十年？因是读书者少，融洽古今、横览中外者更少”；而泰西文字甚为简易，“以二十六字母相生，至于无穷，中人之才，读书数年，便能诵读挥写，故通国男女，鲜不学之人”。^④ 二是因为汉字“象形”，所以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一个个“如峨冠博带，古物庞然”，^⑤难认、难记、难书写。其三，也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致使书面语言（当时人称为“文字”）与口头语言（当时人称为“语言”）日渐疏离，不仅差距太大，而且造成分化：“语言为四民所同有之事，文字乃为士林所独有之事。”^⑥ 贵族化的书面语言“文义太深”，导致民

① 栗万钟：《蒙学堂宜立章程说》，《湘报》第142号，1898年8月31日。

② 宋恕：《六字课斋卑议》，载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135页。

③ 沈学：《〈盛世元音〉序》，载《盛世元音》，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文字改革出版社影印，1956年。

④ 王炳耀：《〈拼音字谱〉序》，载《拼音字谱》，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文字改革出版社影印，1956年。

⑤ 沈学：《〈盛世元音〉序》，载《盛世元音》，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文字改革出版社影印，1956年。

⑥ 张鹤龄：《文敞篇》，载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第522页。

“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解字义，不晓文法”。^①由此，有种种缺陷的汉字便被指为中国落后的罪魁：“夫中国之所以得为中国者，在于文字；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亦在于文字。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实现民族振兴目标的希望，自然寄托在语言文字的改革之上。晚清最早发表文字改革方案的卢懋章就是从便于民众学习新知识以及国家富强的角度提出文字改革主张的。他说：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习理；其所以能好学习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随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②

即语言文字的改革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前提条件，这是当时文字改革主张者共同的思路。于是，语言文字改革便成为甲午以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

还必须看到，19世纪末，中国人思考语言文字问题有着外在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其一，孙中山所倡扬的“振兴中华”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在此主导下，进化（进步）几乎成为普遍的、绝对的价值，改革（“变法”）是所有领域的必然，古老的汉字也不可能例外。而且，包括文字改革在内的所有文化革新活动都必然地被置于救亡图存的政治视野之下；在进化成为绝对的价值观念下，急欲进步的中国人结合近代中国的种种不幸，日益扩大地反省、批判民族既有的文化，把学习西方确立为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基本途径，富强之西方的几乎所有的事物都被视为中国各领域改革的权威性标准，语言文字也不例外。其二，语言文字改革所从属的近代文化运动，已深入到关注“民”和“智”的阶段。所谓关注“民”，即启蒙主义者看到

① 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时务报》第61册，1898年5月。

② 卢懋章：《〈一目了然初阶〉自序》，载《一目了然初阶》，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文字改革出版社影印，1956年。

了“民”是国家富强的主体，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应居于主导地位。对“智”的关注已如上述。而对“民”和“智”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又直接导向“开民智”口号的提出及其活动的开展。其三，自晚清“经世致用”思潮以来，文化上工具主义盛行，“用”——工具化成为当时中国人观察和思考文化问题的几乎固定化的视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时代潮流和文化视角下，首先是那些了解西方文字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古老的汉字作为文化批判的对象，不仅是批评指摘，甚至是妖魔化，文字改革被上升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成为非常重要而急迫的文化革新任务。所谓“开民智”，就是以“农、工、商、兵”等下层民众的识字和学知识为导向。可见，这一时期语言文字（文化）改革的指向并不是语言文字（文化）的自身，而是外于此的民族振兴。

所有这些——语言文字只是工具，必须以此为方向进行改革；语言文字改革的方向是便于民众快速、容易地识字学知识以增“智”，使“民”能真正发挥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主导作用；语言文字改革的参照系是西方的“切音”（即拼音）文字；文字的“象形”、表意代表着落后，表音则代表着先进等——从各个方向决定了当时的语言文字改革者的必然选择，即卢懋章所提“切音为字”（即汉字拼音）、“字话一律”（即口头语与书面语一致）、“字画简易”（即文字简化）。而这三项改革主张的关键是第一项——“切音为字”。因为，既然西方国家的富强是因为文字简易，中国的落后是由于文字“象形”而繁难，那么，西方的“切音为字”即表音文字自然被树为中国文字改革的方向；既然文字的主要功能被确定为如何便于民众识字学知识，其价值的高低取决于难易快慢，那么，创制字数很少、笔画简约的切音字（表音符号），以两个或数个字母拼合为一音一字，“以音求字，字即成文，文即为言”，^①即用拼音字符来拼字读文、甚至代字成文，自然是最好的方案。这样，切音字被改革者赋予了两大功能：一是拼读、拼写汉字的功能，即用数十个笔画简单的拼音字符“相切相拼”、“传音达意”，既易

^① 《都察院代奏工部郎中林辂存请用切音字呈》，转引自力捷三：《闽腔快字》，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文字改革出版社影印，1956年。